

行動研究的孤寂之路

「國內教育行動研究解放了什麼？一個師資培育者的閱讀與困惑」《討論文章》

國立東華大學 教育研究所 顧瑜君

閱讀昭君這篇文章流暢又帶點黑色幽默感的論文時，腦子的某一部份努力保持理智與系統思考，在眾多的人名與案例中穿梭，避免迷失方向，但腦子的另一部份卻像被病毒侵入的電腦，出現似懂非懂的亂碼，亂碼中隱約的冒出國王的新衣童話故事書中的圖像：有趣卻混亂。或許因為來自憂心家人健康與沈重工作雙重的壓力，導致心神不寧，無法專心閱讀導致神智錯亂的幻覺，但我願意相信，那國王新衣的意象，是有某種意義的。腦中隱約的圖像是：那是個類似巴黎的服裝展覽會場裡，當大夥忙碌於讓伸展台展示順暢、各種燈光忙碌的交替轉移、麥克風與音響不斷傳出華麗的介紹詞、台上的展示者賣力的踏著大步，後台熱鬧滾滾的參展者努力裝扮出可以吸引目光的風貌準備出場時，紛擾吵雜的人群中，有一個來自邊台灣邊陲地區、個子矮小的身軀，從人群中冒出來，響亮的聲音指著台上說：他們怎麼沒有穿衣服！

揭開行動研究的假面

在兩萬五千多字的論述中，昭君試圖將自己對行動研究的疑惑澄清，一方面從外顯的資料解析「什麼才是行動研究」，另一方面真切的面對自己憑什麼以那些標準去判斷自己所閱讀的資料。對我來說，行文深刻而真切，誠如她自己所述，該文本就是一種行動研究。可惜我的角色不是評論人，不能大大論述我對此文的認同觀點，當然依照學術慣例，我還需要順便挑一點小毛病，不著痕跡的展示一下自己的學術能力（特別是我的名字在文中看似被肯定的重複出現，我更必需保持「客觀」），就可以交稿了事。學術界很熟悉評論人的角色與任務，但這幾年學術界出現了很多看似熟悉卻陌生的「XX人」，而我不是很清楚討論人、回應人等研討會上看似理所當然角色之間的差異，問了幾個學術界的好友，也整理不出個討論人的規範來，我望文生義的解釋，討論人的責任應該是：在閱讀完後，指點值得繼續探究的方向、建議或引領讀者思考，因此，我自認為我的任務是將蕭文提出的議題進行拓展、延伸或深化的探究。關於適合討論的議題為何呢？我是這麼想的：在這嚴謹的學術活動場域中，充滿著理性與邏輯的思考氛圍，我打算放棄系統與理智的思緒，把腦中的亂碼湊起來，作為討論的基礎：

昭君很清楚的說明，行動研究的衣裳必須是以「行動中反映省思（reflection-in-action）以及行動省思(reflection on action)的精神」為布匹，以「實作、監控、反省、修正、再實作、再監控、再反省、再修正」為針線、手工量身打造的成果。然而從昭君的眼中看出去，市面上充斥著很多「特優」的行動研究，其實光

溜著身體並沒有穿上行動研究的衣裳，卻宣稱他們擁有行動研究的美麗華服，有的在街頭穿梭（研習分享、研討會發表），有的走上了伸展台獲得鎂光燈與享受的簇湧在台下擁擠人群的喝采（領獎金、拿獎狀，獲得出版機會）。昭君試圖從騙子裁縫比劃出的動作中解構，那些騙子裁縫師拿在手裡展示的特殊布匹，根本是行動研究要至死反對的實證典範綿綿密密織成，他們透過工具理性(technical rationality)的操作模式縫製他們希望人們相信的行動研究衣裳，騙子裁縫師們不但自己製造國王的新衣，還開設工廠量產同質的產品，善用行銷的手法使之流行，某些特定的製造商，甚至逐漸開始有壟斷市場的趨勢，而「被騙」的人們，不管是完全自願、半自願或是無知，都漸漸的穿上了這以實證典範思維裁製的行動研究衣裳，很多人也開始嘗試DIY製作這類衣裳，而整個教育界似乎為了維護國王新衣的謊言，所投注下去系統化的努力龐大而壯觀，從辦理研討會、大型的工作坊、出版書籍、以及各種補助與獎勵措施，小個子不只以手指向伸展台上的人沒穿衣服，也清楚的描述整體台灣的教育現場(學者專家、教育主管機構……等)，以類似共犯結構的模式維繫著一個假象，讀者從昭君的文章中應該明白看見台灣壟斷行動研究市場的整體運作，竟然是這樣快速與精密的在過去五年內成長茁壯。

討論的主題與方向是個難題

身為「討論人」，我的責任應該是建議的討論方向，當然從我上述的談話脈絡來發展，我們可以深入討論「真」vs「假」國王新衣，也可以討論誰比較適合哪一種國王新衣呢，然而在採取這個行動之前，我們不妨退一步想想，如果往真假之爭的探究走去，會面臨什麼岔路的可能（使討論失焦、各說各話）：究竟是誰的眼睛有問題，是那個來自台灣邊陲地區的小個子嗎？萬一是小個子的視力出了問題怎麼辦？小個子所指的騙子，真的在製造假象嗎？面對一個罪犯，我們必須理解犯罪動機才能夠判斷其罪行，初步評估那些疑似騙子的動機應該都是「為台灣的教育好」、「維護學術水平」，他們也很努力與認真的進行著符合他們理想與價值的工作，這也可以解釋他們為何需要將不適合在光天化日下（學術研討會場）出現衣裳——「故事」（不是沒有穿衣服，是透明薄紗），巧妙地安排在昏暗夜間議程，不是嗎？**要注意不是退件**。也就是說，從另一個角度看過來，許多學者專家們戴上「學術」的眼鏡所看到的，剛好與小個子看到的相反，真正沒穿上「研究」外衣的是那些說故事者呀，他們才用心良苦盡力協助那些衣不蔽體的人們學習符合學術規範的種種，不是嗎？這樣看來，討論孰真孰假實在是意義不大，需要另找討論主題。

或者，我們也可以想想，那些被騙的人是真是的被騙了嗎？當我們看電視新聞畫面中，被騙者哭訴歹徒如何花言巧語要他們提款百萬的過程時，我們是同情上當者呢，還是心中暗自不屑的想著：「還不是因為你自己心中有貪念哪，不貪怎

麼會那麼容易被騙」，看著重複的騙局上新聞時，我們很難理解：為什麼會有人在貼著明顯告示「凡是提款機退稅都是騙人的」提款機前，將自己的銀行帳戶的錢匯給了騙子，還以為是國家退了稅給自己？我們很困惑為什麼有那麼多人會被相同的手法騙到？於是，我們還可以問，疑似騙子與被騙者之間的共生關係何在？或許我們可以像人類學家一樣，先放下先見(prejudges)的價值，如同到異文化的世界中去理解「他者」的深層文化結構，如果蕭昭君所描述的台灣教育行動研究現況是一個既存的社會實體 social fact，化約的說，從某種特定的文化先見來看，台灣的教育界有一種特殊的文化模式或儀式（我們可以暫時稱呼這個文化模式或儀式為：「集體騙局」），我們也可以討論集體騙局模式或儀式的深層結構意義為何，以及其存在的必要性，或使該特定文化或儀式變遷的可能性。（在「依樣畫葫蘆」的小節中我將繼續解析這個議題）

行動研究者階級的形成

或者，我們也可以討論另一個現象，一個需要認真且嚴肅面對的倫理問題。行動研究在台灣的教育界漸漸的產生了一種階級與特殊的現象：做行動研究的老師，這群基層教師們在教育界形成一個新的階級與族群。不知道這其中擔任行政者的比例、在碩博士班進修的比例、在教學碩士專班進修的比例，據我所知，為數不少的碩士專班正式的要求研究生以行動研究方式進行碩士論文，甚至規定他們要以自己任教學校為研究場域，這些老師儼然已經有別於那些不做、不懂或不曾行動研究的同儕教師，而那些同儕教師們往往因為任教同校或業務相關而必須成為「協同者」，而事實上只不過是被研究者或協助資料提供者，實證研究客體化被研究者的關係悄悄的被美麗的包裝起來長驅直入教育的現場，蕭文裡所描述的協同處境很貼近現實：「人情或上面交代，大部份的協同教師其實是處在『配合』的附屬位置，或是『無聲』的存在」，在以協同行動研究為名的前提下，「行動研究者」以幾乎可以不需偽裝或掩飾的方式，光明正大的擠身於基層教育工作者（被研究者）的日常生活之中，相對於傳統的實證研究，透過問卷發放、結構訪問或觀察，被研究者卻相對的擁有自主「拒絕」的權力，就如我們熟悉的現況，基層學校的教務處準備很多種品牌與顏色的原字筆，每次有問卷來，如果真的發出去填寫，很難回收無法順利完成施測，為了對研究者有所交代，教務處就善意的用不同隻筆（避免顏色與筆跡相同）將所有問卷填完（這也是個有趣的台灣教育界特殊現象：當越來越多基層教育工作者獲得研究所的訓練，他們越清楚知道如何配合與因應研究才得宜、才不至於露出破綻……）。對於實地到校的研究者，個別老師面對訪談或觀察時，只需要提供「短暫的配合演出」，不需要出賣主體性，因為研究者來現場的時間實在是少得可憐（他們多出現在某些固定的時間與特定的場合，很容易預測與預防），因此受到研究者剝奪或巧取的處境畢竟有限。然而協同行動研究或學校本位研究，則徹底的改變了被研究者的處境，使其更為難以面對，試想，如果一個校長或主任「行動研究」「他自己」學校的本位課程，

就出現了十分詭譎的局面，其他參與課程的老師們就很理所當然的變成協同者、變成資料提供者（連同意與否都談不上呢，不同意還有可能被視為不夠專業、或是落得抗拒改革的罪名），他們不能用色澤不同的原字筆當擋箭牌，也不能短暫的失去自由應付觀察訪談者，這些在他身邊做行動研究的同儕們，可以說是無時無刻的存在、隨時隨地的收集資料，難以預測更難防範，明明是「被研究者」還必須頂著「協同的光環」，這群基層教師的主體性該如何呢？這幾屆畢業後到學校去實習的學生們間流傳著一種說法，如果你是社會類科的研究生，你去實習的學校有校長或主任正在進修碩士班，你的實習業務之一就是協助他們正在進修的進修學業，輕則查生字翻譯他們要報告的閱讀材料、整理重點、準備書面報告大綱，重則協助撰寫報告、收集論文資料……關於這類的傳說要證實看似容易實則難（從我這兩年口試在職專班學生論文的內容來看，這傳聞絕非空穴來風；一位好友正在攻讀在職專班碩士，才剛跟我抱怨，他一個學期選兩門課就忙不過來了，要上班還要顧家，不像那些校長和主任下面有一堆老師幫忙寫作業，可以念得又快、省力又省錢），若這是教育現場中漸漸在形成的現象，試問，這樣的現象與昭君的文章有什麼關係呢？我是不是離題太遠呢？聰明的讀者應該可以思考這些現象間的關連，其所牽涉到的權力問題，不正是研究倫理所關注的核心，如果不能理解其中的權力關係，反而以工具理性的方式尋求研究技術化的解決方案（例如請協同者簽署同意書等），將會使昭君所提出的問題更嚴重，如何從研究倫理的本質而非技術面思考研究關係的問題，應該是教育研究、行動研究共通的功課。

依誰的樣畫葫蘆

既然為文作為研討會後續出版，我打算將討論拓展出蕭文的兩萬五千字，納入其他幾位論文發表人及討論人的範疇來觀看蕭文所提出的幾個議題。在黃鴻文的「依樣畫葫蘆」一文中，所描述的教育研究領域的研究生，往往不經思考只找尋方便的統計與研究方式，對照蕭昭君所解析的行動研究在台灣過去五年的迅速發展狀況時，我們不難發現，台灣的教育研究界似乎不管是哪一種派典取向的研究，有著依樣畫葫蘆的共通本質，是誰造成了這種文化？當然，若是每個教育研究者能夠走一條自己的路，使教育研究多樣而蓬勃發展，又對教育現場有所助益，當然是最理想，然而如果依樣畫葫蘆是台灣的教育研究界不可抗拒的本質，那麼，是否可以有不同的「樣」可以被複製呢？（我們不是常聽到一種俗民的教誨嗎：怎麼好的都不學、盡學壞的！）依樣畫葫蘆從另一個角度看去，如果依了「好樣」，畫出好葫蘆，或許不是那麼壞的事吧！然而，這個答案可以從其他幾位討論人的論述中，尋找蛛絲馬跡：在余安邦討論的內容中，這位不屬於教育界的心理學者，毫不客氣的明白直指出教育界裡「老師的老師」（或稱師資培育者）是問題的所在！在成虹飛的討論中陳述基層老師對學者專家的傳遞眼神所透露的期盼（質疑）：「不要告訴我應該做什麼，**橫豎你做給我看**，我看仔細了，自然會決

定怎麼做」，「**你做給我看**」簡單幾個字道盡了其中的奧妙。余安邦和成虹飛的論述誠懇反映出台灣教育界與教育研究界的另一個特殊現象：專家學者或師資培育者似乎很輕易可以置身教育或研究的議題與問題之外，黃鴻文指出研究者長久受到學術文化常規的宰制而「忘記自己是可以思考的個體」，我個人則感受到，教育界的學術文化常規似乎不怎麼認真的面對學生思考與否的問題，這樣做為他們的老師，好像才可以繼續確保自己置身事外的清靜與悠閒，不需去面對紛擾的爭執：不管是研究倫理的還是研究方法的，否則如果越來越多基層教師或學生傳遞壓力要專家學者們、老師的老師們做給他們看的話，他們還可以繼續悠哉的坐得穩嗎？

試問，蕭文所主張的「具有反省性、非工具理性的行動研究」，不清楚昭君在搜尋論文分析素材時，是否也分析了專家學者們所做的研究中，扳著手指算一算能夠指出幾位？能夠列出幾筆資料？當然，除了檢視專家學者們是否做了具有反省理性的行動研究外，我們也可以問問，身為教育界的專家學者類或者師資培育者難道看不出自己的研究生每年都在複製類似的論文嗎？難道一個個都具有博士學位的教授們不能區辨學生的報告、作業是否出於他們自己的努力？不能看出是由他人捉刀的破綻嗎？如果不能，我認為那些要他人捉刀的學生所犯的錯實在不太重，問題出在他們的老師，擔任教育研究教學工作的教授們、專家們，不管這群專家學者或師資培育者是不能或不為，但每個人都貢獻了力量，使得這種教育研究的奇特現象獲得充足的養分、得以如此蓬勃發展。是束手無策嗎？還是共犯結構的一群？當一本一本缺乏教育價值與意義、依樣畫葫蘆的論文送進了國家圖書館，教育學術界的同僚們花在關注整體教育研究品質的問題的精力與時間究竟有多少？還是多數人其實花了主要的氣力關注於屬於自己的前途呢：努力爭取對自己有利的資源（從國科會計畫到各種大大小小的委託計畫）；或是積極的在各種中央或地方的委員會中佔據一席之地，以便在政策決定的過程中發揮影響力（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擔任各種考試的出題或主考時，是為教育選才還是為拓展個人的人脈資源？有多少人忙著跟隨教育政策起舞，政策往哪裡走，研究興趣就往哪裡發展、以學術專業去支持不斷推層出新的教育方案（統整課程、建構教學、開放教育、小班教學、教訓輔三合一、校本課程……）；甚至熱衷於各種媒體的曝光率……，當這些隨手可得的汲汲營營的形象不斷的出現在教育界時，基層教師或學生們眼睜睜的看著專家學者和他們的老師整天在做些什麼，「身教」透露出的訊息跟「具有反省性、非工具理性的行動研究」放在一起思考，就顯得不怎麼搭調，不是嗎，究竟有那些專家學者或老師的老師要做給基層教師和學生們看呢？誰願意、誰又有能力做個「好樣」呢？

置身於行動中的反思

讓我們回到問題的核心吧！昭君的文章中所提到的各種行動研究的問題都

可以追溯到同一個源頭：自我省思或反思(self reflection)，我則認為自我省思應該是所有教育研究的本質，教育研究有別於其他社會科學研究之處究竟何在？或者說做為一個教育研究者最重要該具備什麼呢？然而自我省思偏偏又是那樣的抽象難以描述，現在幾乎人人可以朗朗上口「反思」一詞，昭君的文章裡例舉描述得很真實：很多做行動研究的研究者，明明是檢討別人卻自認為是自我反思，如果自我反思是如此一個不可捉摸的玩意，就算有人做出了很多的「好樣」，依樣畫葫蘆就可以做得一樣的傳神嗎？學得來嗎？自我省思可以教得會嗎？這是否是個更難的題呢。我個人覺得好的樣就算多了，也不盡然可以成就昭君所期望的行動研究數量增多，討論至此，有些力不從心的無助，而面對不確定與無力感，是很不舒服的、有種被困住的感覺，因此，還是得找出路，討論，看似簡單的工作怎麼變得這麼困難。

蕭文的標題有著「解放」(emancipation)二字，暑假期間煩惱著這篇討論文章該如何完稿時，一個遙遠的記憶出現在我眼前：碩士班求學期間同班的南韓金姓女同學在班上分享她對於 emancipation 的認識等於**共產黨、造反、叛亂或危險**的同義詞。記憶猶新的畫面是，她話一出口，班上的美國同學差點沒從椅子上滑落¹……，當時的授課老師特別撥出一段時間讓金同學細細說明，好讓美國同學們瞭解整個社會歷史的脈絡，以及這個經驗的意義與價值（當然那天我這個亞洲人——面對中共打算解放台灣，也成了重要的討論對象）。我自己也好奇著，為何南韓女同學的口中說出的「**共產黨、造反、叛亂或危險**」竟然在相隔十五年的這個缺乏雨水的夏天浮現腦海，回到本文開始，在那個時裝展示會的現場，小個子的出現，好像確實有點要造反的味道，誠如昭君自己心理很明白：撰寫這篇文章，是選擇走上政治不正確的路，書寫原本旨在解開自己的困惑，但此舉很容易被解讀為控訴，確實啊！靜下來想想，觀念或觀點有著兩極化的特質：啟發(enlightenment or inspiration)或武器，啟發感給人帶來更多的理解與力量、促成更深層的對話與澄清行動，而武器可能帶來的是威脅感或傷亡、引導出防衛與反擊行為，哪些觀念會被哪些人看成啟發或武器，該如何推測？感受到啟發的人們或面對武器威脅的人們，何時要採取行動、什麼樣的行動，都是不可預知的。研討會發表當天，昭君文中所引用的一篇論文作者，也是一位基層教師，親自到現場去跟昭君面對面的「對話」，他的指導教授是當天會議的另一位發表人，為了在緊密的議程中讓自己的學生可以暢所欲言，這位發表人縮短自己寶貴的報告時間，將騰出時間「讓給」他的學生陳述自己被蕭昭君如何不公平的解析²。這不

¹ 我的美國同學主多數自由派的人士，例如他們公開支持同性戀等有爭議性的議題，當然，他們的行為也很自由，例如上課時，剛生產的同學帶著新生兒到教室，在同學們面餵為母奶，餵飽後還幫嬰兒拍背打嗝，都完成後，先生就把嬰兒接走，整個學期我們就在孩子不純熟的吸奶動作而發出的吱吱聲、規律的拍背打嗝聲中上課，除了baby偶而發出響亮的氣嗝時，傳染給在場每一個人幸福感之外，課程進行從未因此中斷，沒有人大驚小怪或皺眉頭之類的。

² 如果這本研討會論文集有一個部分是記錄當天討論內容的話，讀者可以詳細瞭解發言內容，為

在議程中的安排，卻成了會場的討論焦點，如果不是受限於學術會場的社會規範與氣氛，那場對話幾乎要成為擦槍走火的激烈對立。這個現象是否值得駐足思考呢，這其中意味著什麼呢？這場意外之旅給撰寫此文與閱讀此文的人什麼意義呢？深究這意外有多種可能，一種選擇是去弄清楚這個意外是怎麼發生的，是巧合嗎？是預謀的計畫嗎？其他被點名引用的人們為什麼沒出現？這位基層教師是如何知道自己出現在昭君的論文中、又是如何決定出現在這個現場？她的指導教授如何跟她商議在會場上該如何進行？她的指導教授（另一位發表人）把時間讓出來的動機與目的為何？這種作法有沒有違反研討會的程序規範與正義？……且慢，這種選擇像是交通事故現場的設法還原意外發生現場的舉動，期望獲得「真實」，證實誰比較有道理、釐清是非對錯。這個探究真實的選擇有著重要特質：技術化解決並可使緊張最快的獲得抒解、可以劃上句號，銀貨兩訖各不相干，然而這與行動研究的本質「實作、監控、反省、修正、再實作、再監控、再反省、再修正」不吻合，行動研究在我來看，有著糾纏的本質，不會很快獲得抒解。

因此我認為，若是用簡單的是非對錯來看待這「意外」，就太可惜了！還原真相的價值與意義實在不高（而且可能永遠也無法還原），這其中應該有精緻與細膩的運轉，整個都與教育研究、行動研究密切的相連著：就現場的局勢看來，昭君的文章應該是被閱讀成了武器而非啟發，既使昭君自認為沒有針對文中所引述的個別行動研究者做屬於人的攻訐或指責，而將焦點放在研究典範思考上澄清，從昭君從頭到尾都明白自己的論述是「政治的不正確」，可以知道，她沒打算心存僥倖的閃避非屬研究典範對話的解讀、也不癡想著讀者只跟她進行研究典範的理性對話，在 to be or not to be 的徘徊中，昭君做了明確的選擇，她的選擇是根基於她的信念與價值：撰寫此文本身就是一個行動研究，屬於昭君的信念必須透過行動去實踐與檢驗（從行動中反映省思以及行動省思）。她必須置身於自己的問題中，為自己文中所提出的疑惑尋找出路，昭君的疑惑之一是：國內教育行動研究的論文報告大家互相引來引去的有關行動研究的定義、特性，行動研究的流程圖劃來劃去也大致相同，這都是外國為主的學者怎麼說（大部份是英美學者），但是，當大家不斷的、片段的引來引去時，我們其實不大知道為什麼這些來自西方的知識是如此的被論述？研討會場中的意外，使得她的行動並未因為完稿交給大會而「完成」，反而繼續進行著，她必須被如此真實而不可避免的被拉扯進來繼續行動（行動研究中的許多行動並不在計畫中呢），如此一來，行動研究的循環就不再是書本裡被抄來抄去的螺旋圖形，而是真實生活中的實踐（攪和

了讓文章流暢並有脈絡，在此，簡要的說明一下當天的對話，蕭昭君被另一位發表人與其學生所質疑的關鍵是：沒有遵守質性研究倫理-未經當事人同意或求證於當事人（引用文本之作者），僅以個人的見解分析文本，有所偏頗與不客觀。蕭昭君的回覆是：她使用的素材都是公開陳設於圖書館的出版品、她以文獻分析的方式進行探究，出版品有著被任何人公開檢驗的本質，此舉與質性研究之訪談資料收集有很大的差異，若用質性研究倫理的視框在當天對話，難有交集、選錯了對話的視框。

或翻滾)，更進一步的說，這場被視為意外的事件，在行動研究的脈絡下，應該被調整與重新認識(reframe)：不該再用「意外」(accidents)去標籤，行動研究中是沒有意外的，行動者必須察覺與理解所有的狀態(contingency/incident)都是action，這樣，才有可能reflection-in-action /reflection on action，都應該是行動過程中、行動場域中必須要納入(taking into account)的自我檢驗歷程，行動者-昭君也必須繼續為檢視自己實踐所引發的行動，繼續反思與行動，行動研究這個從西方傳來的知識就不再停留在教科書的論述，而必須透過行動研究者自身到活生生的人間來打滾、纏鬥，關於行動研究的論述才有可能從教科書走出來、走到台灣的教育現場吧。一如昭君文中所討論，行動研究不太可能如大部分得獎的作品那般整齊又順暢(net & tight)，實際的歷程是充滿著難以描述清楚的不愉快以及讓人煩心的混亂(muddy)，而昭君自己必須踏實的走這一遭，如我建議的這樣走下去，我認為，昭君也算是朝著「我做給你看」的路上走去了。

結語 - 選一條孤寂的路走下去

當年 Michael W. Apple 為了《意識型態與課程》韓文版發行，到南韓演講時曾經歷跟著主辦單位一起被南韓當局逮捕的事件，Apple 應該沒有預料到他會有這趟意外之旅吧，當然，這些都不是偶然：我腦中類似亂碼的影像、南韓女同學的經驗、昭君的政治不正確行動，總應該可以找到一個串連的主軸吧，Apple 在《意識型態與課程》序言中說，很簡要的說了：

教育所涉及的理論、政策、以及實施的問題不全是技術性的，在本質上都是倫理和政治的，而且也牽涉到了個人對於 Marcus Raskin 所謂「公益」(the common good)。(王麗雲譯，2002：VI)

對我而言，主軸很清楚了，教育研究脫離不了三個本質：倫理、政治與公益。Apple 認為教育領域的工作者並不習慣以倫理的、政治的和公益的觀點來看教育活動，更別提批判色彩的觀點了，然而倫理與政治為何物？倫理與政治的範疇何在，在派典不同的前提下，都必將會陷入定義上的爭執，更別提公益了，公益又豈是可以一目了然的被理解與實踐（公益彩券就是一例，有校長將營養午餐的補助款拿去買視聽設備放在校長室又是一例，選用教科書是以什麼為主要判準呢也可以是一例）。閱讀完昭君的解放與困惑，對於有志於往昭君所推崇之教育行動研究者，該怎麼走下一步呢？做為讀者的你，在讀這冗長的討論文章可能已經不耐煩，只想要一個簡單明確的答案，詩人 Robert Frost 這麼說的：選那條行人稀少的路：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聰明的讀者應該已經發現與理解了，除非改宗（踏實的理解研究典範之間的

差異，並做出實踐的選擇，不只是搖旗吶喊的呼呼口號)，在信者恆信的原則下，討論真假國王新衣的意義不大，推翻集體結構的行動，似乎又顯得與個人微薄的力量、有限的時間與精力距離遙遠，而其他我主觀上認為適合討論的議題，又可能造成討論的困境或各說各話局面，因此，選一條孤寂的路，堅定的繼續走下去，是我唯一可以奉上的「確定」，而讀者會問：什麼叫做孤寂的路呢？人少吧！至少沒有熱鬧或喧嘩、沒有彩帶或燈光、多一些看見自己的時間與空間……依照你自己所處的位置給定義吧！誰可以替你說呢？如果可以透過昭君的文章以及我的討論，就釐清教育行動研究該何去何從，我們就成了製造另一件國王新衣的嫌疑犯，可以被當局逮捕。

參考文獻：

王麗雲譯（2002），意識型態與課程，Michael W. Apple 著，台北：桂冠。